

## 1937年 张学良南京被囚

1937年1月1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举行元旦大检阅,杨虎城当场发表演说,反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和纵兵西进。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果然,1937年1月1日,张学良在南京被囚。

“西北大联合”的三方是指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和共产党红军三方。西安事变以后,经过正式谈判,蒋介石基本同意六项要求。蒋介石提出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实行。是时,释放蒋介石已成为确定的原则。但是,对于在什么条件下放蒋,何时放蒋诸问题,“西北大联合”的三方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张学良从兵谏开始就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团结抗日,就放他走,还拥护他作领袖,领导抗日,并表示亲自陪送去南京请罪。他准备“在国人面前受冷静公平的审判。”杨虎城始终主张放蒋要有先决条件。杨虎城明确表示,蒋介石至少应以谈话方式向全国表明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认为,放蒋是重大问题,必须三方都同意。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原则上同意放蒋,但提出“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展到蒋介石不再动摇时才释放”；为防止蒋介石的反复，主张蒋“在走前必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和平谈判后，周恩来曾对杨虎城说，我们没有相当把握，决不轻易放蒋走。和平谈判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蒋。周恩来很快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条件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可是，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陪送蒋介石去了南京。

张学良天真地认为，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负荆请罪，可以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他曾对劲力子说：“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

为达到惩治张学良的目的，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学良应有来京请罪的书面表示，张学良随即上书请罪：“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的大罪。兹汗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蒋介石在得到张学良的请罪书后，立即亲自导演了一幕既恶毒又滑稽的“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

蒋介石首先向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转呈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中常会第 170 次会议通过“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推李烈钧为审判长。开庭当日，由朱培德、鹿钟麟担任审判官，陈

恩普、邱毓桢为军法官、袁祖宪和郭作民任书记官。张学良坦然屹立在被告席上，毫无惧色。当李烈钧追问张学良犯罪事由时，张学良答不知。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言明西安扣蒋之举“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审讯记录送蒋核示后，军事委员会军法处立即将事先拟好的判决书发下，给张学良定罪为“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法庭宣布判决后，随即由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将判决书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经由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1日以第171号指令批准。

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蒋介石致书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主席林森，委员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等出席。同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如下：“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37岁的张学良身陷囹圄，遭监禁达半个世纪之久。

张学良在漫长的幽居岁月中，先后被软禁于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浙江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50年11月，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躬亲送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思想的继续。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1937年12月1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张学良是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他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 圆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创办

员月 圆日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员猿年 员月 圆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迁延安。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除总校外 ,还陆续成立了 员个分校。抗大前后举办了八期 ,培养了 圆余万军政干部 ,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员猿年 远月 员日创办于陕北的瓦窑堡。校长林彪 ,教育长罗瑞卿 ,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红大”要继承黄埔的精神 ,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 ,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 ;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 ,为革命储备干部。“红大”学员共 员圆人 ,分为三科 ,都是红军干部 :第一科是以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为主 ,有 圆多人。第二科与第三科是培养训练红军的中、下级干部。由于当时国内战争没有结束 ,国民党军队不断前来袭击和骚扰。因此 ,“红大”学员还没有正式开课 ,就由瓦窑堡移驻保安县(今志丹县)。保安县城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 ,办学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校舍 ,他们就以城外的破庙、石洞当课堂 ;没有课桌 ,他们就在自己的膝上记笔记 ,做作业 ;没有纸张 ,他们用废纸或敌人散发的宣传品的空白或背面来记笔记、印讲义。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 ,但是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却非常高涨。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参观“红大”后很受感动。他写道 :“有一个

## 抗战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 37 岁,平均每人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负过三次伤。平均每人走过 1 万英里的长征。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的开支在内,每月不到 1 元,而几个著名学生的首级悬赏价值的总数超过 100 万元”,“这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第一期“红大”学员于 1937 年 10 月底结业,奔赴新的岗位。

1937 年 11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将“红大”改名为“抗大”。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爱国青年来到延安,因此,“抗大”第二期除了继续培训红军干部以外,还招收了一批外地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共有 1000 多人。12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000 多名学员毅然打起背包,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力量,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延安。他们不怕艰难险阻,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地。党中央伸开双臂拥抱着一批批热血赤子。接着“抗大”在延安办了第三期和第四期。校舍不够,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窑洞。第三期学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挖出 100 多个新窑洞,解决了近 1000 人的校舍和住宿问题。因此,有人称“抗大”为“窑洞大学”。学校颁布《组织条令》总则中规定了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随着“抗大”声誉的迅速提高,来“抗大”参观访问的人越来越多。1938 年夏,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雷克兰、付路德等人来延安参观,他们对“抗大”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抗大”接收他们为名誉学员。1938 年 10 月,毛泽东为第四期学员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了给抗日根

播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根据地培养更多的干部,在“抗大”第五期时开设了“抗大”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在“抗大”第六期时开设了第四、第五、第六分校,在“抗大”开办第七期的期间,又先后成立了第七、八分校,在“抗大”第八期期间,“抗大”九、十分校和太岳、太行分校相继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和各分校陆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抗大”是伟大历史时代的产物,在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救国呼声中诞生,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成长壮大,最后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及校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中都有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 猿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

昭和元年 月 日,日本国会召开临时会议。在会上,资产阶级议会政党的许多代表在选民的压力下,不得不严厉谴责广田政府的法西斯政策。甚至于政友会都接受了昭和元年 月 日选举的教训,而在表面上放弃了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军部同政党发生矛盾。双方对立影响到内阁内部,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同广田发生矛盾、冲突。由于上述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等原因,迫使广田弘毅于昭和元年 月 日宣布总辞职。

广田下台后,宇垣一成内阁未得到军部支持而流产。林銑十郎组成了“超政党”内阁,由于选举失败,也只维持了 个月,于 月 日垮台。

这时日本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用灵活方法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利用政府来麻痹人民群众的警惕性,并求得国会的支持,推行法西斯政策的政客。近卫文麿适应这种需要,于昭和元年 月第一次组阁。

下野四个月的广田,在第一届近卫内阁再次担任外相。广田在任外相期间,继续鼓吹“日满华共存共荣”,实际上是要灭亡整个中国。

广田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推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对华一击论”,主张乘机给中国一次打击,一举打破华北政策的僵局,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挽回中日邦交不利局面;另一种是“慎重派”,担心如果派兵,将陷入长期战争,提出应尽可

##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能避免与中国交战,专注于当前的对苏备战。广田外相就是属于积极出兵的那一派。由于后一派核心人物石原莞尔的让步,加之前一派势力较强,内阁会议很顺利地通过决定,向中国派兵。

从“七·七”事变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中国,并继续侵入华中。怨月 圆日,内阁决定把“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把侵略目标由华北改向全中国。怨月 源日,当日本第 苑届临时议会开幕时,天皇下达的敕谕,实际是一篇宣战书。

广田外相配合日本的军事进攻,为占领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日本政府想委托德国劝中国投降。怨年 员月 圆日,广田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杰克逊,提出了同中国谈判的所谓“和平条件”。当时蒋介石指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关于中日纠纷的九国会议作出具体的对日制裁措施,因而对谈判不感兴趣。

怨年 怨月 猿日,日军侵入南京。日本法西斯强盗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西方驻华代表目击者称这群日寇为“兽类的集团”。对这种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的罪行,身为日本外相的广田,不但不接受世界舆论的谴责,及时设法制止,反而纵任惨案扩大,致使从 怨月 猿日开始的大屠杀,一直延续到 怨年 员月。

怨年 怨月 猿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更加嚣张,它提出的所谓和平条件更加苛刻。广田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提出旨在了灭亡中国的新条件。这些条件是:(员)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反日、反满政策,与日、满共同反共。(圆)在中国更多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实行特殊政策。(猿)中、日、满缔结经济合作协定。(源)中国应对日本赔款。

广田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他的和谈条件提出后,为进一步向重庆国民党政府劝降, 怨

## 1945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月 猿日,又发表谈话称:“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之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 1945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

广田弘毅利用他在内阁的重要职权,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并积极推行向东南亚扩张政策和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对人类和平和安全犯下了滔天大罪。其罪行仅次于东条英机。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广田弘毅判处绞刑。在 28名绞刑的甲级战犯中,广田弘毅是惟一的文官。1948年 12月 13日,广田同其他 27名甲级战犯一起,在东京被绞死。

### 源瑶东北军分裂

1936年12月12日，被扣留在西安的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亲自助送下回到了南京。蒋介石一面扣押张学良，一面调集各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企图消灭或分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张学良被扣，王以哲成了西安东北军的实际代言人。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使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西安。蒋介石不但坚持不放，反而令中央军步步西进，企图以武力迫使东北军就范。在此危急时刻，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一派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军相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再要求释放张学良。另一派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则主张要蒋介石先放人回来，然后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少壮派做了大量耐心的说服工作，但两种意见仍相持不下，始终未能取得共识，矛盾日益激化。

1936年12月13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尽管两派分歧很大，但会议最终形成“在张副司令回来之前坚持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当时王以哲的全权代表也在决议案上签字。但是，王以哲等高级将领实际上是主和的。少壮派不断鼓动、主张要坚决贯彻“决议”，在这种情况下，王以哲提出接于学忠来西安做主。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之前手谕指定的东北军负

责人,少壮派也同意这种办法,并认为于学忠对蒋介石是忠诚的。

圆月猿日晚,由杨忠诚召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在王以哲家中进行。三方五位代表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会议作出“和平撤退”的决定。圆月员日上午,由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会议,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会议关于撤兵的决定。结果会上众人痛哭流涕坚持要求请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无言以对。同时,王以哲、何柱国在起草撤退命令。

当时,东北军中有一些人认为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不愿执行“渭南决议”,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么高司令回来的希望就渺茫了。尤其是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因此,少壮派于圆月圆日上午让警卫营长孙铭九派连长于文俊去执行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任务。于文俊立即带领圆多名实枪荷弹的士兵,直奔王以哲家,王以哲被枪杀于病床上。这就是东北军历史上的“双二事件”或称“杀王事件”。圆月猿日,驻陕西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到王以哲被杀的消息,立即向西安出发,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报仇。

由于东北军西撤,圆月源日,中央军进入渭南,西安局势骤然紧张。远日,杨虎城率部离开西安,撤往三原。同日,东北军第一韵六师师长沈达,骑兵师师长谭自新等致电国民党政府,向蒋介石投降。其它东北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要求东调。尔后东北军分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地区。至此,东北军完全分裂。

### 缘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大规模内战已经停止,开始出现和平局面。但是,蒋介石还没有真正放弃内战的政策。为了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面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直接与南京政府谈判。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于1937年9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于9月16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内;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共产党做出的必要的重大让步,只有取消了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电报发出后,受到全国各界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的热烈拥护,就连国民党的不少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也表示欢迎。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

李烈钧等 员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杨虎城、于学忠也提出西安方面关于八项主张的提案。 圆月 日,宋庆龄在全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讲演。指出:国民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还在坚持“抗日必先剿共”,这是多么荒谬!她说:“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通过了宋庆龄等人的提案,否决了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比其二中全会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前进了一步。 圆月 日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决议把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输诚受命”,把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说成是“决不断人自新之路”。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的立场,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政策上、策略上作出重大改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始。至此,中国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 1937年12月苏联中央全会的召开

摇摇这次会议是苏联 1937 年代大清洗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做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一个“基本事实”和“理论”。其“基本事实”是，“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斯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其理论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据此理论，这次全会作出了一个决议，其中说到：“全会认为，在反苏托派中心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事实证明，在揭露这些人民死敌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落后于计划至少四年。”同时，党中央又正式授权内务部可以对所谓“凶恶的敌人”采用“肉体压迫的办法”。会后清洗速度加快了，内务部打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曾谈到当时的大规模杀人情况：“据查明，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 1500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共有 100 人，即 7% 的人，在 1937—1938 年被逮捕和处决了”。沙乌米扬在 1937 年 12 月 27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数字。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1500 人，有 100 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到逮捕。接着又开始了对军队的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

## 1937年的故事

案是其中之一。从1937—1938年，陆海军中数以千计的高级干部，包括一大批政工干部被镇压。被镇压的政工干部有：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布林、奥谢皮扬；几乎所有各个军区的军事委员阿麦林、阿隆什塔姆、维克利切夫、哈汉尼扬；各军区政治部主任有：比特、戈沃鲁欣、泽姆斯科夫、伊萨延科、塔鲁津斯基。局级军官有：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军区司令别洛夫、迪宾科、费季科，以及其他许多人。

### 瓜拉哈拉战役

瓜拉哈拉战役发生于1937年7月18日，是西班牙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在1936年底和1937年初，叛乱者和武装干涉者在瓜拉哈拉地区准备大规模攻势。缘万多意大利军、德国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调到这里来。1937年7月18日交战开始，过了四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就转入反攻，反攻持续五天之久，最后武装干涉军溃败，意大利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共和国军队从叛乱者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

## 愿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参谋长

东条英机，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重要魁首。

愿年猿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成为伪满洲国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的副手。

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不甘心当儿皇帝，想有一支归自己掌握的军队，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便建立一支猴国人的“护军”。所谓“护军”，是由溥仪自己出钱，按照军官标准培养的军事骨干。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警卫军”，而是直接由警卫处长佟济煦负责管理。前者，实权在担任次官的日本人手中；后者，归溥仪自己统辖。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了砍掉溥仪的“护军”，在“七·七”事变前怨天，即愿年远月愿日，策划了“护军”事件。这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汽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护军”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日本人无能以对，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万没想到，这下子闯下了大祸。过了不长时间，宫内府外来了一些日本宪兵，叫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出来。佟济煦吓得要命，忙把那些“护军”交日军带走。日本宪兵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各种酷刑虐待。这时“护军”才明白，这是关东军蓄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在互相殴打中有两名关东军参